

又紅又專的道路

——記紅安縣幹部試驗田的發展

姜 純 編 寫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又红又专的道路

——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 明 著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又紅又專的道路

——記紅安縣干部試驗田的發展

姜 純 編 寫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武漢

又紅又專的道路
——記紅安縣幹部試驗田的發展
姜 純 編 寫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湖北省新華書店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5}{16}$ 印張·29,000字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統一書號: I 3106·143

目 录

领导作风大转变	干部脱脚下了田.....	1
为了解决新矛盾	書記动手搞試驗.....	4
三者紧密相结合	共同培育試驗田.....	7
干部試驗获高产	群众增产大丰收.....	11
干部人人受教育	又紅又专好道路.....	14
再来一个大跃进	广泛发展試驗田.....	17
做什么就鑽什么	样样工作带头干.....	23
哪里不跃哪里去	扩大生产指导面.....	27
开展技术大革命	普遍依托試驗田.....	30
种試驗田成制度	指导生产有規律.....	37

湖北省紅安县的干部种試驗田，已經有一年多了。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試驗田在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由县委書記种試驗田，到干部种試驗田，由少数干部种試驗田，到全体干部种試驗田；由农村干部种試驗田，到机关干部和学校教师种試驗田；由种一种作物或少数作物的試驗田，到种几种作物或多种作物試驗田；由干部种高产試驗田，到群众种大面积丰产試驗田；由种生产試驗田，到“种”工作“試驗田”，直到全党全民种試驗田，干部走上又紅又专的道路。

领导作风大转变 干部脱脚下了田

1956年11月16日那一天，在中共紅安县委会里，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由新来不久的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共黃岡地委的決議，根据二中全会精神，結合本县情况着重分析和討論了为什么在干部中会出现“三愿三不愿”的作风？为什么农村会出现“四多一少”的情况？对这个問題，进行了追根，找出了根本原因。

在这以前的干部作风情况是：愿坐机关，不愿下乡；愿住先进地方，不愿到落后地方去；愿坐在办公室开会同干部打交道，不愿下田生产同群众打交道，在机关的干部縱然下乡，也是“无車不下乡”，下到农村去，“三天想进城”，住在机关的干部也是“三人不同房”，一味比吃喝，比穿戴，很少比工作。这时候，机关与农村相比是“头重脚輕”，机关里人浮于事，农村里

办社人少。因之，农村生产冷落，上街的多，办私事的多，搞副业的多，晒太阳的多，出勤生产的人少。如永河乡一个170户的联建社，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有30户去打柴火，24户上街买货办嫁妆，13户打算搞副业，还有二、三十人在门前烤火，只有极少数人参加生产，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县普遍存在。至于干部以参加生产的方法，来领导生产，更是少见。两道乡党支部書記郑世炳在1956年的秋收后，为自己做屋耽誤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刚入冬时，县里布置犁水田，他带着一种抵触的口吻說：“我戴上絨帽子，穿上棉鞋，还覺得有点冷哩！叫别人下田犁水田，怎么說得出口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县委委員們对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檢查了原因，主要是县委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正如下面干部对县委的批評：“光叫我們这些人去做，就是沒有看到县委做的样子”，多的是會議、布置、空談，少的是下乡、实做、檢查，在18名县委委員中长期在乡的只有3人，包括临时下乡的也不过7人，以致造成下面干部飄浮不深入，机关干部不愿下乡，农村工作无人做，有的人也不知道怎样去做。最后決議：在县委委員中由14人下乡领导农村生产，并从机关抽調300名干部下乡指导生产。从此，县委委員們走出了办公室，跳出事务圈子，集中力量加强了农业生产的领导。

此后县委带着20多个工作组下乡，决心带头干，脱脚下田，深入生产，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副書記張景田同志，在翹台乡金星一社，发现二队有块油菜苗因旱枯黃，有的社員說：“澆过两次水无效，再无法挽救”，于是，他在田間同社員們研究，是因为澆水太少的关系，根部沒有吸收水分，他一方面向社員講道理，一面脱脚下水挑水澆苗，社員們弄通了思想，又在他的实际行动影响下，15个社員都跟随他挑水，往日社員一

壩澆一瓢水，他澆了三瓢水，澆了四、五寸深，社員說：“這樣做，保險能活”，第二天，張書記就以這丘田召開了全社32個干部的現場會，干部們看到快要死的苗變活了，相信了抗旱保苗有好处，當天就組織120多個男女社員，將快要旱死的47畝油菜都澆了一次水，第三天，通過全乡性的現場會後，掀起了2千多人的抗旱保苗運動。縣委第一書記程鵬同志，在杏花鄉——縣委重點鄉，發現干部不深入，生產搞不起來，他一面帶頭參加生產，組織干部檢查生產；一面又深入五房崗生產隊，研究如何安排生產，修訂勞動定額。從而，摸出了問題，做出了樣子，迅速在全鄉組織了200多個干部的現場會，把全鄉生產運動，推動了起來。

縣委委員們在下面，深入了生產隊，到處參加生產，到處做樣子，又及時通過現場會，由自己現場表演，這樣一來，就帶動了廣大干部轉變作風，放下架子，參加生產，領導生產，兩道鄉黨支書鄭世炳在看到縣委委員的實際行動後，深刻的批評檢查了自己，他說：“我們這些人忘記了打長工的出身，擺起了當老爺的架子，”回去，一到家就脫掉了絨帽和鞋襪，下畝同社員犁水田去了。在各級領導干部的帶頭下，干部普遍參加了生產，農場鄉6個隊干部帶頭脫腳幫助社員挖陷田，帶動了這個鄉的鄉干部和社主任都參加了生產。鄉黨支部書記吳斌在曹門社帶病脫腳下田，帶動了半年來沒有參加生產的社主任吳茂如，也下了水，他並很慚愧的說：“我們這些人，再不參加生產，就成了群眾的罪人，”因而，帶動了全鄉群眾積極投入生產，男女社員出勤率由原來62%增加到93%。全縣10925名干部，97.3%的人參加了生產。社員們對干部的評語是：

干部作風大轉變：

往日“白腳杆”，

如今是“庄稼汉”，
能工作，又会种田，
真是文武双全；
只要干部带了头，
生产誰不攢勁干。

为了解决新矛盾 書記动手搞試驗

当干部普遍轉变作风、参加生产后，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对干部进一步轉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就是干部对于如何領導好生产，还缺乏經驗，特別是有些干部作风还未彻底轉变过来，下畝参加生产，檢查生产，多是空着手，搖搖摆摆，群众仍然看不慣。如在高桥区指導組曾发生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指導組的組长王树昌同农場乡党支部書記，有一天下畝檢查生产，路过联盟五社六家边（灣名）的田埂上，碰上一个正在忙碌着的社員，对于他俩搖搖摆摆的走路很不滿意，并开口就罵：“娘卖瘟的，空着个手，搖搖摆摆，象个相公样，莫把我的田埂踩坍了，”王树昌問：“你罵誰？”那个社員說：“我罵你的，怎么样！”王树昌同志把这件事告訴了在当地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張景田同志。張景田同志說：“罵得对，这是因为我們参加生产不够深入、領導生产不具体的緣故！”張景田同志終于出了一个主意，下午，他独自上店街上化了1.36元买回了一把鋤头。他背着鋤头回来向干部們說：“我們参加生产，要象个参加生产的样子。”并指着鋤头說：“沒有这个家伙，还是不容易把架子放下来。”当时干部們举起双手贊成他这个办法，于是干部們都买了一把鋤头。这个經驗在全县傳开了，全县干部是一人买了一把鋤头，这就叫做“一人一把鋤”参加生产，領導生产的方法。这比前一段是更深入了一步。

時間到了1957年的3月，生产活路日益緊張，开始进入大农忙的时候，社員非常喜欢干部帮助他們做活，可是有的干部只搞一会儿就走了，社員就諷刺他們說：“你們哪里是来参加生产的？明明是来监督我們生产的”，有的还說：“我說啦！你們怎能吃这个苦？这事是我們这些老土儿（种田的）做的”，干部們接受了这些批評后，参加生产至少都是搞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这时又出現了埋头生产、忽視领导生产、只了解个别情况、对全面情况不了解的現象，对于什么是工作中的經驗、什么是工作中的問題也很少研究。县委办公室打电话往下面要情况，不仅是找不着人，找着人了也沒有什么可談，有的干部还埋怨县委办公室：“你們这些人不曉得別人的苦，白天参加生产，夜晚要开会，哪里来的那么多情况啊！”張店乡副乡长熊傳煜一连在星光社劳动3天，4天头上，回去开会，一点情况也談不出，他在支部書記面前发牢騷說：“这是搞的什么名堂，人累得腰駝背脹，情况不了解，生产冒搞好。”这时，駐农村工作的干部，可以說都是同病相怜，十分希望有一个既参加了生产，又了解了情况，又领导了生产的好办法。

这时候，在县委重点乡——杏花乡工作的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同志和县委农工部长庫从德同志开始摸索到了解决这个問題的办法，就是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用来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4月，正当花生播种的时候，程鵬同志考虑：如何把花生种好，获得大面积增产呢？感觉自己对于这方面的知識还很欠缺，于是他决定向技术干部学习，向老农学习，便去找城关区技术指导站长祝翼鴻，和建苏社五房崗生产队生产花生有經驗的富裕中农秦必权以及这个队的技术員秦老五一同开座談会，研究花生增产問題。程鵬提出：“怎样叫花生多增产”的問題，叫他

們獻計、提意見。首先祝翼鴻說：“要想花生增產，就要多施肥”。程鵬反問：“不是有些人說：‘花生不用肥，施肥長氣殼’嗎？”秦必權接着說：“那是懶人說的懶話，我往日興花生是年年施肥，不過要看地，不光施水肥，還施草木灰。”程鵬問老祝：“你說哩？”老祝說：“必權說得對呀！花生不僅要施氮肥，還要施磷肥。”老五還在旁邊找了一句：“老話說：生嘴兒要吃，生根兒要肥，哪有过種庄稼不用肥的？”他們商量的結果，決定要施底肥。老祝又接着說：“要想花生增產，還要改變過去每壩下一粒米或兩粒米的習慣，每壩應把3粒米。”程鵬又回頭問秦必權：“你往日有這個經驗沒有？”“我往日把過3粒米，”秦必權回答：“把3粒米的好處是，可以減少缺苗，就是損了一粒也有兩粒，如果只把一、兩粒要是損一粒，就會是獨根、缺棵。”他還說：“我往日看到的，3粒米一兜比兩粒米一兜要多結10來個花生”。商量的結果，決定壩壩把3粒米。老祝還主張普遍用根瘤菌拌種，可是有些人不懂根瘤菌的作用，以為是殺蟲的，經過老祝解釋，說是一種肥料，於是決定：用根瘤菌拌種。此外還討論了密植。近几年花生種得很稀，決定搞7×8寸密植最好。還研究了花生中耕、除草、培土壅兜等問題。這時程鵬考慮：花生增產關鍵是明确了，那麼到底怎樣做呢？怎樣叫大家都會做呢？于是他同老祝、秦必權、老五等商量共同搞一塊試驗地做個樣子，一方面自己從中學習技術，一方面做得別人看看，好叫別人照着樣子去做。第二天就在五房崗後面按照他們所研究的技術種了一畝地，並在播種時召集了建蘇社的80多個社隊幹部來參觀，他同他們一面做着一面說着，大家對他們這塊地十分贊揚，反映說：“要是都象這樣做，花生肯定要增產。”這句話傳到程鵬的耳朵里，更是受到啟發。花生種完了，程鵬征求大家的意見：“這樣做行不行？”“有沒有意見，”大家異口同

声的回答：“我們回去也照这样办。”最后程鵬肯定的对大家說：“你們回去一定要照这样办，首先自己先搞一块試驗地，叫社員来看，叫社員也照你們那样办。”最后还叫老祝、秦必权講了花生技术。建苏社的社队干部果然回去都搞了試驗地，給社員做了样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員們說：“只要你們（指干部）有样子，說得人心服，我們就照葫蘆画瓢（比着做的意思）”。

程鵬这次的收获是什么？他回去兴高彩烈的和庫从德同志以及办公室的干部們說：“我深深体会到，要把当前的生产领导好：第一，干部参加生产，不能埋头干，不能乱跑，要亲手种試驗地；第二，要同技术干部和老农結合在一起研究，在一块儿搞；第三，干部亲手做出样子，就召开現場会，現場交流，現場推广。”他說完后，庫从德同志也接着談了他們的体会：“前几天到处跑，总是冒搞出名堂来，近两天我在火燒王家生产队栽秧，头天研究栽秧質量，第二天我就下田一同栽，但昨天栽的就和今天栽的不一样，有的稀、有的密、有的深、有的淺，我发现这个情况后，就在田头边召开了現場会，讓大家来評比，誰好，誰坏？哪好，哪坏？这样一評，就評出了会栽秧的王世宏了，大家就向王世宏看齐，再下田去栽，大家就注意了，質量栽好了”。庫从德同志还說：“这要是象往日乱跑，这个問題就不能发现、解决”。

紧接着召开了县委会議，討論了干部种試驗田的問題，分析了干部种試驗田的好处，和一般参加生产不能领导好生产的原因。从此，干部种試驗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就正式在县委会上作出了决定。

三者紧密相結合 共同培育試驗田

5月間，干部培育試驗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

法，在全县普遍开了花。住农村工作的县、区、乡、社（只包括社主任）干部1470人，有1151人都建立了試驗田（地——下同），其中有县委委員14人、区委書記（包括指導組長）17人、乡支書45人、社主任632人，共培育了水稻646.4亩、花生476亩、紅苕100亩、棉花125亩等，作到了春夏播各項农作物，样样有試驗。

干部培育試驗田的做法是：一人或几人培育一块田或几块田，培育一种作物或几种作物，培育的具体方法，都是貫徹“三結合”的方法，并不是一个人包干一块田，而是干部、技術員和有經驗的农民結合在一起进行耕种試驗，干部在整个培育过程中自始至終的参加研究，参加劳动，并从中学习技术，抓住生产关键，指导生产。一般是2、3人，多至5人，建成小組。在試驗或貫徹某項措施前，先通过研究，必要时召开老农座談会，或聘請老农为顧問，先取得一致的意見，而后試驗，成功后推广。边生产，边研究，研究一件，做一件，通过現場会进行推广。对于試驗、推广农民固有的、有把握的生产經驗，是边做、边推广；属于新的生产技术、在試驗前把握不足的，待取得成功或有效后，再推广。推广的方法是：現場推广，現場表演，試驗田为現場，由干部現身表演。如楊山乡創造的花生根外施磷肥的經驗，就是副县长肖林山同技术干部郑启栋在楊山三社試驗成功的，成功后，迅速召开了全乡現場会，进行推广。結果这个乡290多亩花生地都进行了根外追磷肥。仅这一項措施，就增产花生75 000斤。

台南乡党支部書記吳祖权，在联誼社的落后地改良土壤种花生。他首先訪問了老农金孔堂，总结了他的改良土壤种花生能增产的經驗，于是就同生产队长金昭大和金孔堂一起改良半亩地，先翻挖，后增施肥料，再翻犁，結果深耕到7寸，紧接

着又召开了全社現場会，大家都認為他們这个办法好，一致贊成这样干，于是全社22.5亩落后地的土壤，都进行了改良。又以这个社为榜样，召开了全乡現場会，全乡500多亩落后地，也改良了土壤。秋收时，这些进行了土壤改良的地，比1956年要增产一半到一倍，平均亩产由1956年的480斤增至640斤。

事实說明，干部种試驗田，必須貫徹“三結合”的方法，这对于领导、技術人員和农民群众本身，有很大好处，三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对于领导干部來說，通过种試驗田，就学到了实际的生产知識，增长了领导农业生产的資本，找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的鑰匙和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經驗、实行以点带面、点面結合的武器，实现对农业生产全面的、深入的具体领导。也就能够及时的了解情况，发现問題，倾听群众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智慧，有效的避免或减少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的贯彻执行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对于技术干部來說，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帮助，就發揮了鑽研技术的积极性，向领导干部学习了群众路綫的工作方法，向农民学习了生动活潑、实际具体的生产經驗，既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又提高了技术、业务水平。对农民來說，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最切身的利益，从而更加發揮了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創造性。这些好处，是领导干部、技術人員、农民群众三者相結合的基础，所以說干部种試驗田，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根本方法，三者相結合又是种好試驗田的根本条件，只有三者結合起来种試驗田，才能發揮試驗田的作用，才能巩固和提高試驗田的方法。

貫徹三結合的方法，还可以解决种試驗田中許多具体問題，特别是生产上的管理問題。比如：当地生产习惯和生产技术問題，占用劳力、耕牛、农具和肥料問題，以及田間管理問題，

等等，就可以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是说，只要是三者结合起来种試驗田，就不致于因缺乏技术而种不好田，就不致于因沒有生产資料而荒廢了土地，就不致于因种田和工作发生矛盾而影响田間管理，造成减产，相反的，由于同群众打成了一片，就会得到群众多方面的支持，更热心的帮助干部找窍门，出主意把試驗田种好。1957年在全县种試驗田的干部中，有300多名是外行，100多名青年知識分子，他們也居然把試驗田种好了。而且比群众一般产量还高。

但是，也不可設想，只要是三个人凑在一块儿去，干部只是挂个名，就可以把試驗田种好，这种“試驗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实上也是种不好的，起碼是起不到干部試驗田的作用，这就是說，干部建立試驗田有了三者結合的条件之后，还必须下苦心鑽研，大胆創造，付出应有的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三者相互之間的依靠，博得群众的支持，达到試驗田的成功。这里举一个青年知識分子——龔清安为例：他是1956年离开学校，1957年春走入农村，初到农村时，什么都不懂，麦子和韭菜也不分，連会議也不敢召开，不敢說話，后来經過3个月的摸門和大半年种試驗田的鍛炼，不仅把試驗田种好了，試驗的半亩花生地，获得亩产1025斤的高产，而且在生产上成了內行干部。因为他下了苦工夫，当初他聘了占店乡占店一社的老农夏先华給他当“顧問”，另外还拜了一个技术干部为老师，在生产过程中，群众做什么，他做什么，技术干部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不会就学，不懂就問。群众推車子，他也去推，把車子推翻了，人摔了跤，爬起又推；群众犁田，他就去帮助群众牵牛、背犁，要求群众告訴他如何犁田。这样一来，他在生产上的主要活路，差不多样样都会了。这說明干部种試驗田，有了三結合的条件，还必须加一个虛心学，苦心鑽，决心干的“三心”态度。

为了保証貫徹三者的結合，紅安县委1957年就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不輕易調动农村工作干部的工作，实行长年包干，长年固定。这样就可以树立干部长期培育試驗田、领导生产的事业心，可以使干部与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二是县、区、乡三級领导干部的重点社，必須配备技术干部。全县8个区，区区都有技术推广站，48个乡，乡乡都有技术干部。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是同駐一社、一队，共同研究，共同試驗。三是各农业社也要建立必要的技术組織，全县根据合作社的規模大小，分別建立技术委员会和技术小組等，每个队都有技术員。全县732个合作社，共有水稻、花生技术員9200名。这既是一支强大的技术推广队伍，又为三結合种試驗田的方法准备了条件。

干部試驗获高产 群众增产大丰收

試驗田成为紅安县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知識，鑽研生产技术的“实验园地”后，领导生产的才能就多起来了，同时試驗田获得了高产，創造了奇迹，又带动了广大群众大面积增产，使全县获得社社增产，样样丰收。

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同志培植的一亩花生試驗地，获得亩产826斤，另有一块每兜300个花生的試驗，实收有200—300个；县委候补委員，七里区区委書記王作中同志試驗的一亩花生，获得亩产1190斤；县委常委、副县长肖林山同志，培育的两亩水稻，获得亩产千斤，县、区、乡、社干部的試驗田，都获得了丰收和高产。

他們之所以能够試驗成功，获得高产，正是他們虛心学习，苦心鑽研，細心培育的成果。也是他們大胆創造，打破陈規，敢作敢为的結晶。他們体会到：种試驗田要敢于大胆的干，書本上有的要干，書本上沒有的也要干；上級指示过的要干，上

級沒有指示的也要干；群众中习惯的要干，群众不习惯的也要干。所以他們在試驗中干过了許多过去不敢干、不敢想的事，創造了許多在書本上找不到的、上級沒有指示过、群众沒有做过的、新的生产經驗，因而，也就解决了許多过去解决不透，或根本沒有解决的問題。

例如，深耕：过去群众总是說“犁无3寸土，碗无2寸深”，或者說“深耕了，翻起了生土不长谷哇”等等，在当时有些干部也是这样說：“不能深耕啦！群众說翻起死土不长谷，有道理呀！”这些人似乎是在那里“走群众路綫”，实际上是自己不鑽研，不懂生产。1957年高桥指导組副組長王文全，在占店乡占店一社試种一季晚粳时，有些社員就說：“深耕不得呀！深耕不得呀”。可是他并沒动摇，他說：“我就要坚决試驗一下，到底深不深耕得？！”春耕时，他在1.4亩田里，用新式步犁犁了5寸深（社員只犁3寸深），犁后耙細，他又橫犁一道，一連犁、耙了8次（社員一般只犁、耙5次），这样把犁起来的生土都拌勻了。他想：深耕就要多下肥料，于是他下了400担肥料（社員一般只下200担），再加上其他措施，这丘田結果获得亩产1500斤，比合作社同样作物一般产量高出50%。这时社員又說：“深耕得！深耕得！还是深耕多打谷”。

再如，密植：过去在群众中到处流行着“稀三担，密六籬，打起粮食一般多”的說法，以致年年总是稀植。1957年在干部試驗田里，就打破了这个常規，不仅有5×5寸的密植試驗，还有4×4寸的密植試驗，再加上多施肥，这些試驗都成功了。城关指导組組長耿良瑜在天馬乡民胜社試驗0.5亩田一季粳4×4寸密植，获得亩产1918斤。桃花乡党支部書記試驗的一季晚粳4×4寸密植，也获得亩产2050斤。从此，社員們再不是說“稀三担，密六籬”，而是說“稀植产量低，密植产量多”。